

# 收入与幸福关系的经济学考察

赵奉军

(复旦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摘要:**经验研究显示,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并没有带来国民幸福程度的上升,这无疑违背了传统的绝对收入效用理论。但是,引入相对收入理论将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变得毫无意义,而另一种理论试图将欲望集引入效用函数以此来解决收入与幸福的悖论。如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研究怎样才能增进人们的幸福。

**关键词:**收入;幸福;视角

**中图分类号:**F0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4)05-0075-10

## 一、导 论

收入增加会带来幸福的增加吗?或者更通俗地问一个问题:金钱能买快乐吗?(黄有光,1978)。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经济学家看来应该是不容置疑的。因为从基本的微观经济学中我们得知,收入增加会扩张生产可能性和预算线的边界,使消费者到达更高的效用无差异曲线,因而能获得更高的满足程度。但是国际社会科学界近 30 年的探索似乎正在修改这个看似颠扑不破的结论。收入与幸福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当然也相当有趣。

需要说明的是,对幸福的最初量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柏拉图认为,有王者气质的人最幸福,最不幸的是专制的独裁者。他用一种独特的方法计算出,王者的生活比独裁者的生活快乐 729 倍。18 世纪末,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鼻祖边沁从快乐主义原则出发,认为幸福可以通过人们所体验到的快乐和痛苦情感的权衡来测定,快乐或痛苦的价值由强度、持续时间、确定程度、切近程度、增殖性、纯度、扩展范围 7 个因素决定。他还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计算方法来度量个人的苦乐状态及社会的苦乐趋势。边沁的努力重新激发了人们度量幸福的兴趣,但是由于过分注重构成幸福情感要素的量,他的研究也受到了广泛的质疑。福利经济学以及后来的新福利经济学,都没有尝试

收稿日期:2003-12-20

作者简介:赵奉军(1974—),男,湖北荆州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讲师。

对人们的主观体验进行边沁式的度量。他们很快就将注意力投向了度量主观满足的“客观对应物”——诸如国民收入、社会福利函数等方面。经济学家普遍用“效用”(utility)取代了幸福(happiness),后来又用序数效用取代了基数效用。从此幸福就退出了经济学的视界。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国际社会科学界对幸福的研究已经积累了2 500多篇文献(Veenhoven, 1993),经济学家的贡献确实少得可怜。近年来有所改观,特别是著名的《Economic Journal》在1997年连续发布了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对幸福的讨论(黄有光, 1997; Oswald, 1997),在诸如生活质量和生活标准的研究中,幸福这个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指标正在逐渐被接受。

另外,经济学家对幸福的研究之所以带有抵触情绪并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替代的问题,而是很多学者认为幸福是一个规范性研究,而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性科学不应该涉足其间。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需要澄清。国际社会科学界这么多年的研究并没有给出一个关于什么是幸福的定义,也很少探讨如何才能幸福等规范性问题。如典型的美国民意研究中心每年的调查问卷中关于幸福的问题:“总的说来,你觉得最近:A. 非常幸福(very happy); B. 相当幸福(pretty pappy); C. 不很幸福(not very happy)。”调查者事先并没有给出幸福的确切定义,而是将这个定义让渡给了调查对象,由调查对象自己来确定幸福的标准和自己的幸福感。因此这种调查虽然仍具有主观性,但结果却是客观的。并不涉及到“幸福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更没有涉及到调查者预设的价值判断。所以这种误解即幸福的经济学研究是一种主观的和规范的研究是不对的。黄有光先生在一篇论文中也谈到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幸福的衡量与人际比较,最多只是对事实的主观判断(subjective judgment of fact),不是价值判断(value judgment)(黄有光, 1972)。

正是由于来自经济学界之外的对幸福的孜孜探索,关于幸福的数据才得以非常之丰富。在互联网上甚至存在一个幸福的国际数据库,这客观上为经济学家研究幸福与收入、经济增长与主观福利(subjective well-being)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让经济学家所擅长的定量研究有了用武之地。

本文首先将讨论收入与幸福关系的经验研究,包括横截面和时间序列数据,以厘清学界在收入与幸福上的争议。其次将给出对数据的有关解释,包括相对收入理论和笔者给出的另一种理论。最后是余论与政策含义。

## 二、经验研究

如前所述,无论是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还是在人们的感受中,收入增加应该会带来幸福的提升。例如人们往往认为,高收入会带来幸福的三大要素:身体健康、心理乐观、婚姻美满。但是实证研究的结果却与人们的感受和微观经济理论大相径庭。有关幸福与收入的经验研究包括计量研究主要得出了以下

三点结论:

结论 1:在一国之内,时间序列数据没有显示幸福水准与经济增长或收入水平的长期正相关关系;

结论 2:在一国之内,横截面数据分析显示收入更高的人平均而言具有更高的幸福水准,但相关性也不是很强;

结论 3:国际横截面数据大体支持富国比穷国更幸福的说法,但一旦按照收入分组,富国之间的收入水准与幸福程度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穷国同样如此。

最早的关于收入与幸福的经济学研究是南加州大学的 R. A. Easterlin 于 1974 年发布的。他的数据主要采自美国,其主要结论是经济增长并不会提高福利与幸福,他建议我们应思考个人与他人收入的比较中的效用。换言之,幸福可能只是相对的(Easterlin, 1974)。但是笔者仔细研究了他所依靠的数据,发现他的结论与数据存在不合,如表 1 所示。

表 1 美国人的幸福(1940~1950 年)

年份	非常幸福	不很幸福	人数
1946	39	10	3 151
1947	42	10	1 434
1948	43	11	1 596
1952	47	9	3 003
1956	53	5	1 979
1957	53	3	1 627

数据来源: table 8 of Easterlin(1974), using us AIPO pool date.

最近的一组数据由美国 GSS(General Social Surveys)给出,GSS 几十年来一直在调查美国人的幸福水平,这些调查每年随机抽取 1 500 名美国人,所得数据如表 2 所示。

表 2 美国人的幸福(1972~1990 年)

年份	非常幸福(%)	相当幸福(%)	不很幸福(%)
1972	30.3	53.2	16.5
1980	33.9	52.7	13.3
1990	33.4	57.6	9.0

数据来源: Blanchflower(1993), from US GSS.

我们还可以得到一组欧洲发达国家的数据,如表 3 所示。

表 3 欧洲国民幸福水平调查(1973~1990 年)<sup>①</sup>

单位: %

国家	平均水平 (1973~1981 年)	平均水平 (1982~1990 年)	幸福增加了吗
比利时	39.5	24.7	否
丹麦	51.7	62.8	是
法国	12.4	13.7	是
西德(当时)	18.8	23.4	是
爱尔兰	38.8	31.1	否

续表 3 欧洲国民幸福水平调查(1973~1990年)<sup>①</sup>

单位: %

国家	平均水平 (1973~1981年)	平均水平 (1982~1990年)	幸福增加了吗
意大利	9	13.2	是
卢森堡	34.6	39.1	是
荷兰	41.3	41.8	是
英国	31.7	30.9	否

数据来源:Oswald“Happines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The Economic Journal (November), 1997, 1815~1831。表中所列的数据为对生活非常满意的平均水平,选取样本为每国每年近1 000人。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美国人中感到非常幸福的人数在上个世纪 40 到 50 年代一直是递增的,而这段时期也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因此至少从数据上看,Easterlin 的结论是令人费解的。这也许可以安慰经济学家。但不幸的是,表 2 传达了美国人的幸福水准在过去 20 年中没有多少提升,始终保持在 1/3 左右。表 3 再次印证了表 2,9 个欧洲国家中,比利时、爱尔兰和英国的幸福比率甚至下降了,即使是幸福增加的国家除丹麦外都很轻微。

在时间序列数据中,最不可思议的就是日本,从 1958 年到 1987 年,日本人均收入提高了 5 倍,但其平均幸福水准始终保持在 59%左右,没有上升的趋势(Veenhoven,1993)。

除时间序列数据外,横截面数据的分析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先把目光局限在一国内部。比较某一时点上,不同收入的人的幸福感。与常识相符。收入更高的人确实具有更高的幸福感。

表 4 美国 1994 年按照收入分组的幸福水平分布

单位:美元

收入水平	平均幸福等级	非常幸福	相当幸福	不很幸福
75 000 以上	2.8	44	49	6
50 000~74 999	2.6	36	58	7
40 000~49 999	2.4	31	59	10
30 000~39 999	2.5	31	61	8
20 000~29 999	2.3	27	61	12
10 000~19 999	2.1	21	64	15
小于 10 000	1.8	16	62	23

数据来源: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1999),Question 157,其中,非常幸福=4,相当幸福=2,不很幸福=0。

另外,根据 Easterlin 的研究,如果将日本收入分为 3 组,处于最高收入组的平均幸福等级要显著地高于收入最低的一组。(Easterlin,1974)。

这样一来,横截面的数据似乎和时间序列数据是冲突的。既然横截面数据已经显示收入的增加与幸福呈正相关,那为什么在一个时间序列数据中没有显现出来?这个问题,是收入与幸福的争议中的一个焦点问题。

除了一国横截面分析外,国际间收入与幸福的横截面数据使得问题显得更加复杂。例如,Veenhoven 在研究了近 30 个国家的数据后发现了人均收入

水平与幸福的正相关,回归结果在1%水平上是显著的。但是,排除印度数据后,收入与幸福的关系不再显著。或者将样本分为两组,无论是超过还是低于8 000美元,也不存在显著关系。换句话说,跨国的数据尽管支持收入更高带来更高的幸福,但一旦将国家分组,则各组间不同国家的幸福水准与人均收入并没有正相关(Charles Kenny,1999)。

其他类似的研究也大体支持高收入的国家具有更高的幸福等级(Easterlin,1995;Inkeles,1993)。但这种跨国的横截面的分析存在很大缺陷。正如有人指出:发达国家的更高水平的幸福可能归功于文化因素及社会资本的差异(Inkeles,1993),如表3所示,即使在人均收入水平很高的欧洲国家,对生活感到非常满意的丹麦的数据是63.8%,而意大利只有13.2%。因此一国内的时间序列数据应该是一个更好的比较收入与幸福的方法。

在经验研究中,还出现了另外一个悖论。既然时间序列数据显示在长期人均收入与幸福只存在轻微的正相关关系,那么一个人有理由预测,当调查对象评价自己过去和未来的幸福时,将报告没有多少改变。举例来说,如果某年某国有30%的人报告自己非常幸福(4分),50%的人报告自己相当幸福(2分),20%的人报告自己不很幸福(0分),加权平均幸福等级为2.2。5年后我们可能得到上述分布大体不变的数据。但是如果接着问对过去幸福感的评价时,绝大多数人的回答是现在比过去幸福,颇有一点“觉今是而昨非”的感觉。这实际上是矛盾的。既然人们普遍觉得今天比过去幸福,那么今天的平均幸福等级就要超过2.2,可是又为什么在时间序列数据中没有显现出来?

### 三、解 释

怎么解释上述发现?如何理解发达国家幸福水准在过去20年中原地踏步的事实?如果依靠传统的经济理论,效用函数 $u=u(y,h,i,j)$ ,其中 $y$ 是收入, $h$ 是工作时间, $i$ 和 $j$ 是个人和工作参数。假设效用是绝对收入的增函数。只要绝对收入增加,工作时间不变,效用就应该增加。但事实和经验研究并不支持这种绝对收入函数。而在社会心理学教课书中,效用函数往往被定义为 $u=u(y,y^*,h,l,j)$ , $y^*$ 被定义为相对收入或参考收入。如果参考收入不变,绝对收入的上升确实会提高效用。但如果参考收入也在发生变化,则效用有可能保持不变。

将相对收入引入效用函数可以很好地解释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揭示的结果。因为在时间序列数据中,最经常的结果是个人收入的普遍增加。尽管个人收入增加会导致幸福感提升,但社会平均收入或者是参考收入的提高也会导致幸福感下降。两者可能相互抵消,使幸福感保持不变。所以幸福经济学的先驱Easterlin在1974年断言:同时提高所有人的收入,幸福保持不变。

同时,相对收入函数也能解释横截面数据。在某一时点上,如果参考收入

保持不变,收入高的人的效用要高于收入低的人。但也不排除收入高的人的参考收入和收入低的人是不一样的。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相对收入函数的解释力就要大打折扣。

迄今为止,经济学界主流并不认可这种相对收入理论。虽然在笔者看来,相对收入理论并没有完全否定绝对收入理论,因为相对收入理论仍然遵循了绝对收入理论的假定,只不过引入了一个新的前提,那就是参考收入不变。在实证分析中,人们可以找到很多相对收入影响甚至决定幸福的例子。例如实验经济学中著名的“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s)已经显示了个人宁愿不要实际收入的增加也要获得一个相对公平的份额。另外 Clark 和 Oswald 1996 年的一篇文章也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相对收入理论。他们用 5 000 多个英国工人的数据试图证明效用(幸福)依赖于相对收入或参考收入。计量结果显示:第一,工人报告的满意水平与他们的绝对收入水平弱相关,而与他们的相对工资呈显著的负相关。第二,保持绝对收入不变,越高的教育水平具有越低的满足程度。对于第二个发现笔者稍作解释。教育程度的提高同时也提高了期望收入水平或参考收入(Clark, Oswald, 1996)。

在笔者看来,将相对收入引入效用函数尽管有很强的说服力并得到实证检验的支持,但仍然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它将颠覆很多经济学者习以为常的概念,典型的如帕累托改进将不复存在,经济增长也变得毫无意义。当然,笔者在此需要加以提醒的是,穷国从赤贫状态起步,收入的普遍增加确实会提升普遍的幸福感。这一点即使是相对收入理论的鼓吹者 Easterlin 也承认。从这个意义上说,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不应该盲目信奉相对收入理论。<sup>②</sup>

另外,相对收入理论也无法解释人们在幸福评价上的“觉今是而昨非”现象。按照相对收入理论,如果甲乙两人收入同时同比例增加,幸福应保持不变,尽管统计结果确实显示了两人报告的幸福状态没有变化,当两人又同时声称比过去幸福,这似乎证明了绝对收入理论仍然在起作用。在此,笔者提供一种理论试图来统一解释经验研究中的两个悖论。基本思路是将马斯洛的层次需求论变形引入效用函数。即收入增加,幸福感也会增加;但是如果收入不变,欲望增加,幸福感会减少。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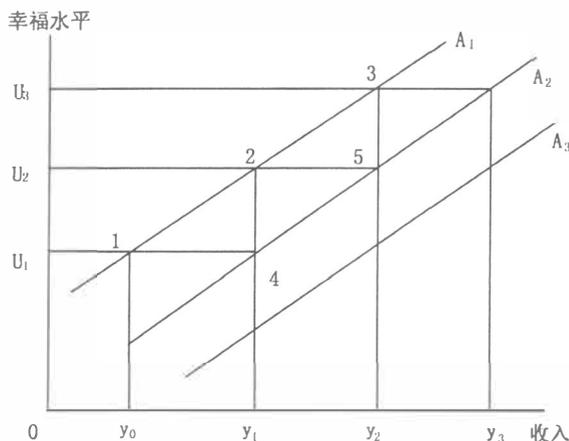


图 1 收入与幸福关系的变动曲线

外,欲望集会随着时间和收入的变动而变动。数学表达式为  $u = u(y, A, 0)$ ,  $y$  为绝对收入,  $A$  为欲望集,  $0$  为影响幸福的其他因素。

如图 1 所示<sup>①</sup>, 假设在某一时点上, 在当时的收入水平和整体经济环境下, 某个典型的经济人收入水平处于  $y_0$ , 欲望集用  $A_1$  表示。则其幸福水平为  $u_1$ , 收入水平上升, 如果欲望集不变, 他将沿着曲线 1 移动到点 2, 幸福水平相应上升。但事实上收入水平上升的同时也会导致欲望集的移动, 假设欲望集由  $A_1$  变到  $A_2$ , 我们发现尽管收入由  $y_1$  增加到  $y_2$ , 但幸福保持不变。这就能很好地解释在长期人们的幸福感为什么没有随着收入的增长呈现显著的正的变化。另外, 模型也能很好地解释横截面数据。由于横截面数据是假设时间处于某一点, 则合理的假设是在这个时点上所有经济人的欲望集是相同的。这个假设需要特别说明, 既然在长期中收入的增加会导致欲望集的变动, 那为什么又假设高收入的群体与低收入者有相同的欲望集, 两者矛盾吗? 我的解释是这样的。首先, 欲望并不代表有效需求, 穷人收入低并不表明他不想买游艇住别墅, 实际中表现出来的欲望集的差别往往只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 如果信息是流动的和充分的, 可以假设穷人富人在同一时点上有相同的欲望集。当然两者的欲望的强度肯定有高低之分。其次, 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往往具有时间趋势, 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的发展以及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还包括制度的变革, 欲望集肯定会发生改变。如果这个假设成立, 则在某一时点上, 高收入的群体由于其欲望的实现程度和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低收入者, 当然其幸福程度要高于低收入者。

现在我们来解释为什么经济人往往会认为现在比过去幸福, 将来比现在幸福。如图 1 所示, 如果一个经济人的起初欲望集是  $A_1$ , 收入从  $y_1$  增加到  $y_2$ , 由于欲望集的改变, 经济人的均衡点从点 2 直接移动到点 5。幸福水平保持不变。现在问他是否比过去幸福? 他的回答实际上是依赖现在的欲望集  $A_2$  而不是过去的欲望集  $A_1$ , 在现在的欲望集  $A_2$  支配下, 过去的收入水平只有  $y_1$ , 幸福水平处于  $u_1$ ,  $u_2$  大于  $u_1$  是明摆着的。所以典型的经济人都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评判过去”。同理由于欲望集没有变化, 当经济人预期收入从  $y_2$  移到  $y_3$  时, 幸福水平将上升到  $u_3$ 。

也许有人要争论, 点 5 比点 2 应更幸福。因为点 5 代表了高层次的欲望集, 所以点 5 是更高层次的幸福。这一点我们也必须做出解释。首先, 默认的规范并不考虑所谓的更高层次的幸福, 正像调查者只是年复一年地询问同样的问题。还有所谓的更高层次的幸福在常识上也是于理不通的。正像我们不能说儿童的痛苦就是低层次的痛苦一样。我们的分析只是严格依赖调查对象的当时的感受。举例来说, 一个农民的欲望集在长期会随着收入的重大变化而发生改变, 如果他在 5 年前觉得非常幸福而 5 年后也觉得非常幸福, 统计规范就认为他的幸福水平没有变化。但他往往会觉得比 5 年前幸福, 那是因为

如果将他的收入瞬时降低到5年前的水平,在现行的欲望集下,他一定会觉得痛苦不堪。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厚今薄古只是经济人的一种错觉。

#### 四、余论及政策含义

无论是相对收入理论还是笔者的一些想法都似乎有否定经济增长的意味。按照相对收入理论,人们之所以拼命赚钱其实是陷入了一种囚徒困境之中,最终出现的均衡其实并不符合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要求。<sup>④</sup>

由于把经济增长定义为“人均收入水平的长期提高”(North, 1973),使得对幸福的经济研究往往也集中在收入上,本文同样如此。其实其他一些经济因素同样会影响幸福。典型的如就业,实证研究表明失业是影响幸福感的第一要素(Clark, Oswald, 1994),再比如社会收入分配状况,如果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大多数人的收入处于参考收入以下,将会出现心理学上所称的相对剥夺感。整个社会的幸福水准自然会下降。另外,开放和社会流动性对幸福的影响是双重的。开放尤其是向发达国家开放会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但同时开放也会产生“消费示范”效应导致国内的参考收入上升或导致欲望集发生改变,对幸福的影响殊难预料。而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会增加人们的收入,使人们有更多的机会改变自身的处境,一般说来幸福会提升。2001年,Alberto等人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欧洲,收入的不平等对人们的幸福感有显著的负的影响。在美国统计上却不显著。作者的解释是相对而言,美国具有更大的社会流动性,而欧洲人更偏好一个平等的社会(Alberto, Tella, Culloch, 2001)。

至于非经济因素,由于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也超出了笔者的学识。笔者只将国际社会科学界的研究结论简述如下:一般来说,已婚者更幸福,有宗教信仰者更幸福,教育水平高者更幸福,女性更幸福,老人和小孩更幸福(幸福与年龄的关系呈u型,30岁往往是幸福的最低点)。

关于收入与幸福的讨论远远没有结束,有些问题仍然存在很大争议。甚至有学者认为是幸福导致了经济增长,而不是相反(Kenny, 1999)。笔者也确实认为,经济增长不能等同于幸福。幸福而不是经济增长才是人们的终极目标。回到我国,迄今为止,笔者尚未见到类似于美国民意研究中心的我国国民幸福水平调查,但无论是按照胡鞍钢所说的“一个中国,四个世界”,还是孙立平所言的“一个断裂的社会”都在提醒我们,我国的人均收入尽管翻了几番,甚至一些大城市的人均收入已赶上发达国家,但国民的总体幸福水平不尽人意(黄有光, 2002)。如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那么我们实在有必要仔细研究怎样才能增加人们的幸福。在笔者看来,我国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如何增加占人口大多数的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人口的收入,以提升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另一方面,在经济发达地区,社会政策的目标如果仍局限在增加人们的收入上,可能不会有什么太好的

效果。这无疑给社会政策的制定者带来了双重挑战。

注释:

- ①欧洲国家的数据与美国的不一樣,欧洲国家的调查问题典型的为“一般来说,你对你的生活感到:非常满意(very satisfied),相当满意(fairly satisfied),不很满意(not very satisfied),非常不满意(not at all satisfied)”。
- ②相当多的学者一致认为,在长期中收入增加没有增加国民的普遍的幸福感只有在“衣食无忧”后出现。因此可能存在一个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收入水平,这个收入水平大约是4 000美元(Diener,1995)。
- ③Easterlin在2001年提出了一种与笔者的思考十分类似的思路,他同样是将欲望(aspiration)引入了效用函数,笔者的图示完全来自Easterlin的贡献。
- ④黄有光认为长期中人们收入的增长并不会带来幸福的增加而人们仍然还拼命赚钱,主要原因在于人们的非理性,无知或短视。但笔者的疑问是,即使承认有限理性,但我们很难承认在长期中人们也是非理性的。

参考文献:

- [1]Alberto Alesina, Rafoel Di Tella, Robert Mac Culloch.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Ar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different? [J]. NBER, NO. 8198, 2001.
- [2]Blanchflower, D. G. and A. J. Oswald. 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 [J]. NBER NO. 7487, 1999.
- [3]Charles Kenny. Does growth cause happiness, or does happiness cause growth? [J]. Kyklos v52, NO. 1, pp. 3~25, 1999.
- [4]Clark, Oswald. Unhappiness and unemployment[J].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04, pp. 648~659, 1994.
- [5]Clark, Oswald. Satisfaction and comparison income[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61, pp. 359~381, 1996.
- [6]Diener, Ed and Carol Diener. The wealth of nations revisited: Income and the quality of life[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6, pp. 275~286, 1995.
- [7]Easterlin, Richard.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 [8]Helliwell, John.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capital in Aisa[J]. NBER NO. 5470, 1996.
- [9]Inkeles, A. Industrialization, moderniz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31(1), pp. 1~23, 1993.
- [10]Lane, Robert. Does money buy happiness? [J]. The public interest, 113(fall), pp. 56~65, 1993.
- [11]Michael R. Hagerty and Ruut Veenhoven. Wealth and happiness revisited[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64, pp. 1~27, 2003.
- [12]Ng, Yew-Kwang. Value judgments and economist's role in public recommendation[J]. Economic Journal, September, pp. 1014~1018, 1972.

- [13]Ng, Yew-Kwang. A case for happiness, cardinalism and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J]. *Economic Journal*, 107, pp. 1948~1858, 1997.
- [14]Oswald. Happines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J]. *The Economic Journal* (November), pp. 1815~1831, 1997.
- [15]Veenhoven, Ruut. world database of happiness[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4, pp. 299~313, 1995.
- [16]黄有光. 金钱能买快乐吗?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 [17]罗伯特·莱恩. 市场经济的乐趣缺失[J]. *战略与管理*,1996,(4).
- [18]诺斯. 西方世界的兴起[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 [19]邢占军. 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综述[J]. *心理科学*,2002,(3).
- [20]胡鞍钢. 地区与发展:西部开放新战略[M].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
- [21]孙立平. 我们在开始面对一个断裂的社会? [J]. *战略与管理*,2002,(2).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Happiness: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ZHAO Feng-jun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Empirical study shows that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increase of per capita income have not brought about the increase of people's happiness, which is contradict with traditional absolute income utility theorem. But the introduction of comparison income theory may make economic growth meaningless, while another theory attempts to introduce desire into utility function to solve the contradictory of income and happiness. If the aim of social policies is to realize 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study how to increase people's happiness.

**Key words:** income; happiness; perspective